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的思路与框架

黄先海 杨高举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罕见的“增长奇迹”，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发展道路。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对此难以提供全面、准确的解释，因而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开放型经济学知识体系。本文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系统阐释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一个涵盖理论基石(动态竞争优势)、动力机制(制度型开放)、核心领域(贸易、投资、金融、数字贸易)、政策范式(赋能型贸易政策)以及战略选择(双循环与全球治理)的递进式系统框架。并从理论内核重塑、政策范式革新和新开放观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独特运行规律与学理创新，旨在为世界经济开放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动态竞争优势；赋能型贸易政策；制度型开放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70(2026)01-0001-09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罕见的“增长奇迹”(林毅夫等，2012)^[1]，其成就不仅体现在巨大的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上，更在于其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持续动态跃迁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稳步提升(杨高举和黄先海，2013)^[2]。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后发转型社会主义大国”特征，在制度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黄先海和宋学印，2025)^[3]；在规模上，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区域发展的多层次性(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4]；在路径上，采取了渐进式、“点线面”结合的开放策略(林毅夫等，1993)^[5]；在动力上，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制度型开放与创新机制。中国不仅实现了贸易规模的跨越式增长，更打破了发展中国家易陷入的比较优势陷阱，实现

[收稿日期] 2025-12-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数字化变革、数据要素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721413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典型案例研究”(22BJY212)；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美贸易战 2.0 与全球供应链重构”(2025JDKT11Z)

[作者信息] 黄先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高举(通讯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电子邮箱 0011666@zju.edu.cn

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跃迁(杨高举和黄先海, 2014)^[6]。

长期以来, 解释世界经济运行的知识体系主要由西方经济学主导。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 再到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Krugman, 1996)^[7]及梅利兹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Melitz, 2003)^[8], 这些理论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解释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部分规律, 但其立论基础往往基于私有制、完全市场竞争或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当我们将这些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时, 往往会出现明显的“解释赤字”(裴长洪和刘斌, 2020)^[9]。这一客观现实呼唤着理论的创新。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不仅是对过去中国开放发展经验的学理升华, 更是指导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迫切需求。这一体系的构建, 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修补和套用, 而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与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析工具进行有机融合, 解释中国独特发展道路,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实现理论的本土化与时代化, 确保理论构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一、内生逻辑与结构向度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在于深刻把握并立足于中国作为“后发转型社会主义大国”的独特国情。这一独特定位意味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具有多重属性叠加的复杂性: 作为后发国家, 中国面临着从跟随到赶超的技术跨越任务; 作为转型国家, 中国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 呈现出以开放促改革的独特动力机制;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区域发展的多层次性, 具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生能力。这种区别于拉美模式或东亚模式的实践特征, 决定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必须跳出西方小国模型或单纯比较优势的窠臼, 从中国丰富的实践土壤中汲取养分。在此基础上,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实现从解释中国到理论创新的根本性突破, 其核心任务是打破“用西方原有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叙事范式, 通过发掘并凝练如“动态竞争优势、赋能型贸易政策、制度型开放”等具有中国标识性的特有概念, 构建一套逻辑自洽、具有国际对话能力和中国标识性的学术话语体系。这不仅是为了解释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增长奇迹, 更是为了提炼出具有—般性规律的理论成果, 如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利共赢开放理论, 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基于上述总体思路, 本文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需形成一个涵盖理论基石(动态竞争优势)、动力机制(制度型开放)、核心领域(贸易、投资、金融、数字贸易)、政策范式(赋能型贸易政策)以及战略选择(双循环与全球治理)的递进式系统框架(如图 1 所示), 将基础理论创新与具体的贸易投资实践、宏观战略布局有机结合, 形成一个解释力强、覆盖面广的知识体系。

首先, 该框架的确立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石和逻辑起点。针对西方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在解释中国产业快速升级时的静态局限, 引入获得性要素(如

人力资本、技术、数据)，阐述中国如何通过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动态跃迁。这一理论内核为理解中国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和数字贸易等具体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统一的解释逻辑，构成整个知识体系的元理论(黄先海和宋学印，2025)。

其次，在理论基石之上，需对支撑开放型经济运行的核心领域与政策保障体系进行充分阐释。这涵盖了对外贸易的分工优化与福利提升、外资引进的要素整合与高质量发展、对外投资的双循环布局与绿色发展、金融市场的审慎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数字贸易这一新兴领域的业态创新。为了支撑这些领域的有效运行，需要赋能型贸易政策这一独特的政策范式，即政府如何通过中立地赋能贸易机会、要素供给和制度条件，而非简单的价格扭曲，来有效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黄先海和宋学印，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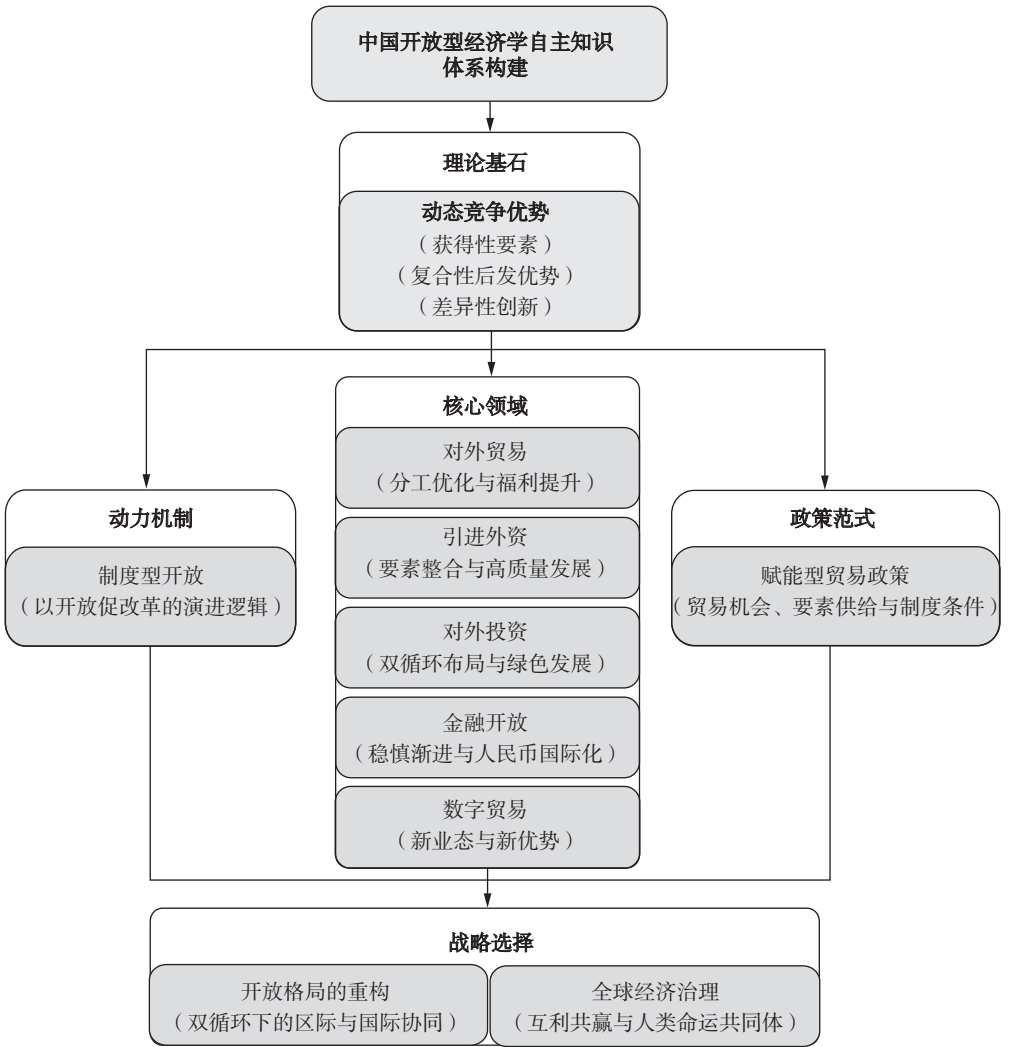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框架

最后,探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开放格局与全球治理等战略选择。包括充分阐释大国的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协同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揭示以开放促改革的演进逻辑,特别是新时代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型,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度保障;在全球维度上,阐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利共赢开放观,主张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全球视野与大国担当。

在上述总体框架的基础上,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可在基础理论、政策范式和新开放观三个方面实现创新与突破。

二、理论内核的重塑:从比较优势到动态竞争优势

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在于实现基础理论的范式转换。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贸易理论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n)的要素禀赋论为基石,主张各国应依据其现有的劳动力、土地或自然资源等天赋要素进行国际分工。然而,这种理论本质上是静态的,容易将后发国家锁定在“资源出口”或“低端加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伟大实践证明,比较优势并非外生给定且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与要素积累实现动态转化。藉此本文提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深刻揭示了后发大国如何通过主动干预与市场培育,实现从禀赋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跃迁。

(一) 获得性要素的内生积累与要素结构重塑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对要素禀赋外生性的假设。在传统的静态框架下,要素被视为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约束条件,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既定的分工角色;而中国实践表明,资本、高级技术、专业化人才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数据,均属于可以由人为创造和加速积累的获得性要素。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全方位的教育投入,实现了要素结构的系统性重塑。这种积累并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当高素质人力资本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结合时,会产生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和网络外部性。这种内生积累机制使得中国能够快速从低技能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向高素质劳动力的“人才红利”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原生禀赋的约束,为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提供了核心驱动力。

(二) 复合性后发优势下的追赶与“蛙跳”机制

针对后发国家如何实现技术赶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复合性后发优势的辩证逻辑,超越了单一的技术模仿路径。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内部发展的非均衡性和产业梯度的多层次性,使得我们能够同时利用两种不同性质的后发优势。一方面,在传统制造领域,中国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进行低成本模仿和“干中学”,通过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效率驱动的追赶式增长,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黄先海和宋学印,2017)^[10];另一方面,在新兴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中国利用技术换代产生的机会窗口,发挥大国市场的应用场景优势和制度组织能力,直接跨越传统技术阶段实施“蛙跳”式发展(黄先

海, 2005)^[11]。这种追赶与“蛙跳”并存的复合机制, 极大地缩短了优势转换的周期, 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保持中低端制造竞争力的同时, 在部分前沿赛道迅速确立全球领先地位。

(三) 差异性创新与大国市场的规模效应

当经济体逐步逼近世界技术前沿时, 传统的模仿路径失效, 动态优势的维持必须转向基于自身特质的差异性创新。在大国开放框架下, 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是消化产能的场所, 更是创新试错与优势固化的超级实验室。差异性创新强调利用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复杂性以及产业配套的完整性, 通过高频次的商业模式迭代和产品功能创新, 形成区别于西方先发国家的独特竞争力。这种创新逻辑的核心在于: 利用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 将规模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和创新优势。通过需求驱动倒逼技术攻关, 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在模糊的技术路径上以更低的试错成本实现突破。这种基于大国市场深度的创新不仅提升了贸易的扩展边际, 更使得中国能够在全球分工中从被动嵌入转向主动重塑, 确立了在数字贸易和绿色产业中的全球话语权。

因此, 从比较优势向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重构, 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学理标识。它揭示了要素禀赋可以内生创造、分工地位可以动态跃迁的深刻逻辑(如图 2 所示), 不仅为中国迈向贸易强国提供了学理支撑, 也为广大希望通过自主创新改变命运的后发国家, 贡献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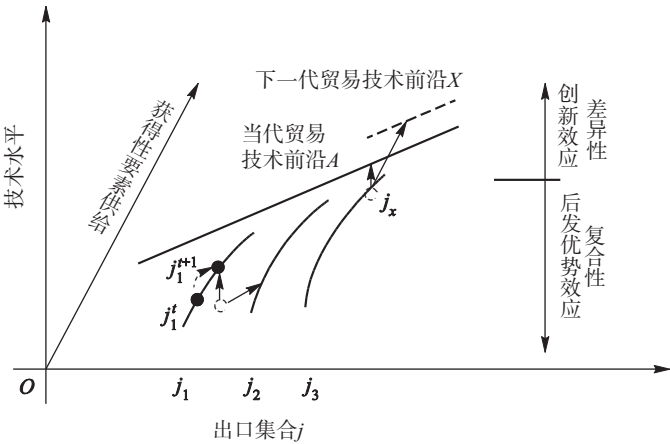


图 2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

三、政策范式的革新：赋能型贸易政策体系构建

在确立了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后, 必须回答政府在优势转换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由放任”与“保护主义”的二元对立, 也不同于拉美模式的进口替代或传统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 中国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赋能型贸易政策。该政策范式的核心逻辑在于: 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微观企业的经营决策, 也不单纯依赖扭曲价格的财政补贴, 而是通过中立地赋能贸易机

会、要素供给和制度条件，提升经营主体的国际竞争力。这不仅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理论的重大创新，更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极具标识性的学理成果(黄先海和宋学印，2025)。

(一) 机会赋能：从被动准入走向主动创造

赋能型贸易政策的首要维度是为贸易主体创造和拓展国际市场参与机会。在传统理论中，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着高昂的搜寻成本和信息壁垒(即新新贸易理论中的固定出口成本)。中国政府通过搭建国家级的贸易促进平台，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施了系统性的机会赋能。这种赋能机制本质上是政府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特别是进博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贸易政策从侧重“奖出”转变为进出口平衡与共享大市场，通过主动开放市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集聚，使国内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前沿技术与消费趋势，从而在互动中激发动态优势的转化。这种平台化的机会赋能，有效地缓解了市场失灵，实现了贸易红利的普惠化。

(二) 要素赋能：构建支撑动态优势的公共产品体系

赋能型贸易政策的深层支撑在于对关键生产要素的“软硬赋能”。动态竞争优势获取高度依赖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供给。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于新型基础设施(如 5G、工业互联网、跨境物流枢纽)，实现了“硬要素”的赋能，大幅降低了贸易的流通成本与响应周期。更加关键的是“软要素”的赋能。政府通过支持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为贸易主体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在数字贸易领域，这种赋能体现得尤为明显：政府通过制定数据安全标准、建设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座支持。要素赋能并不针对特定企业提供差异化补助，而是通过提升整个产业环境的要素丰裕度，使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成本洼地获取国际竞争力。

(三) 制度赋能：以制度型开放优化贸易运行环境

在新时代背景下，赋能型贸易政策的重心已向“制度赋能”发生战略偏移。制度作为最基础的赋能变量，决定了贸易主体的长期预期与创新意愿。政府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压力测试，将国际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如负面清单管理、竞争中立、贸易便利化等)转化为国内制度安排。这种制度赋能通过减少行政干预、简化通关流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环境。特别是针对“边境后”障碍的清理，使得中国贸易政策实现了从要素红利向制度红利的切换。制度赋能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更通过与国际规则的深度对接，提高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话语权，确保了动态竞争优势能够在公平、透明的国际规则框架下得以释放。

赋能型贸易政策体系是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的政策应用。它通过机会、要素与制度的三位一体赋能，既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体现了有为政府在战略引领与环境营造中的独特优势。这种政策范式有效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遵守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同时，依然保持强劲的产业升级动力，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提供了具有普适意义的“中国模板”。

四、新开放观的建构：制度型开放、双循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不仅关注一国之福利，更应具有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单边主义，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利共赢开放观，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基于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主张非零和博弈与合作共赢。

（一）开放格局的重构：双循环下的区际与国际协同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其开放不仅仅是沿海对国外的开放，更涉及国内区域间的开放与协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体系必须涵盖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的双重维度，这构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空间基础。

不同于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使得中国可以利用母国市场效应，先在国内形成规模经济，再参与国际竞争。区际开放（消除省际贸易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际开放（降低关税、便利化）必须协同推进。通过“东部引领、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区域战略，中国形成了产业在区域间梯度转移与升级的机制，延长了产业链在国内的留存长度，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非封闭运行，而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其理论逻辑在于：利用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通过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要成为“世界市场”；不仅输出“中国制造”，更要输出“中国需求”和“中国创新”。这一框架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如何在大国博弈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战略定力与发展动能。

（二）制度变迁的动力：以开放促改革的互动机制

西方制度经济学往往将制度视为既定的约束条件，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则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深刻揭示了以开放促改革这一独特的制度变迁逻辑。

中国开放与改革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深化。（1）倒逼型改革。在开放初期，通过引入外部竞争压力和国际规则约束（如加入 WTO），打破国内既得利益格局和旧体制的束缚，以推动市场化改革。（2）学习型改革。在开放中期，主动借鉴国际先进制度安排（如现代企业制度、负面清单管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3）创新型改革。进入新时代，中国不再是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而是开始进行制度创新（如自由贸易区的制度集成创新），并试图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如在数字贸易领域），实现从适应规则到塑造规则的转变。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已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标志着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制度型开放要求在“边境后”措施上与国际高标准对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不仅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更是推动国内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一招。通过在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开展压力测试，中国正在构建一套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三) 价值追求：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利共赢开放观

中国主张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即互利共赢开放观，超越了传统国际经济关系中仅追求本国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其核心内涵包括：共同发展(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共享机遇(反对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共担责任(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在实践中，体现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同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工具，“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和规则标准的“软联通”，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打破基础设施瓶颈，融入全球价值链。这标志着中国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者”转变为重要的提供者，从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和“改革者”。

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转变，将对世界开放与发展带来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增长贡献，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引擎；二是公共产品贡献，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基础设施联通、产业合作等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发展瓶颈；三是治理贡献，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多边主义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对西方经济学的简单修补，而是一场基于中国伟大实践的深刻理论革命。

这一体系的核心逻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充分发挥大国规模优势和后发优势，通过赋能型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以开放促改革)，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升级(动态竞争优势)，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攀升。这一体系的实践路径是：坚持渐进式、试点推广的开放策略，统筹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这一体系的价值导向是：坚持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内在规律，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全新选择。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这一知识体系必将不断丰富、完善，在世界经济学理论之林中占据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M].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 [2] 杨高举,黄先海. 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2): 25-45+204.
- [3] 黄先海,宋学印.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55 (9): 22-36.

- [4] 刘志彪, 孔令池. 从分割走向整合: 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8): 20-36.
- [5]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J]. 经济研究, 1993 (9): 3-11.
- [6] 杨高举, 黄先海. 中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吗? [J]. 管理世界, 2014 (5): 5-22.
- [7] KRUGMAN P R.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 MIT Press Books, 1986.
- [8]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23, 71 (6): 1695-1725.
- [9]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 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2): 46-69+205.
- [10] 黄先海, 宋学印. 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追赶导向”到“竞争导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6): 60-79+206-207.
- [11] 黄先海. 后发国的蛙跳型经济增长: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J]. 经济学家, 2005 (2): 41-47.

The Ideas and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Open Economics

HUANG Xianhai YANG Gaoju

Abstrac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achieved an unprecedented “growth miracle”, carving out a distinct path of ope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heories often fall short of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or this phenomenon,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for open economics. Drawing upon China's great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lineates a holistic framework for such a system. It proposes a progressive structure encompass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dynamic competitive advantages), driving mechanisms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core domains (trade, investment, finance, and digital trade), policy paradigms (empowering trade policies),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s (dual circul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unique operation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open economy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reconfiguring the theoretical core, innovating policy paradigms, and broadening perspectives on openness,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and approaches to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a's Open Economics; Dynamic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mpowering Trade Policies;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责任编辑 武 齐)